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features a large, stylized illustration of pink flowers and leaves. The colors range from light pink to a deeper magenta. The style is soft and painterly. On the right side, there is a vertical line of text.

英美后女性主义 媒介批评研究

段慧◎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本书由南京财经大学学术出版著作基金资助
本书由江苏省政府留学奖学金资助

英美后女性主义 媒介批评研究

段慧◎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英美后女性主义媒介批评研究 / 段慧著. -- 天津 :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8.3

ISBN 978-7-310-05557-9

I. ①英… II. ①段… III. ①后现代主义-女性-传播媒介-批评-英国、美国-现代 IV. ①G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33371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刘运峰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4号 邮政编码：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9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022)23502200

*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8年3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787×960毫米 16开本 16.25印张 263千字

定价：52.00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022)23507125

序 言

2012年9月，第五届“BLCU国际文化研究论坛”如期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媒介与性别研究：历史与批评”（Media and Gender Studies: History and Criticism），除了早已约请的安杰拉·麦克卢比因家人突然住院而临时缺席之外，其他同属伯明翰一系的洪恩美（Ien Ang）、杰基·斯泰西（Jackie Stacey）、艾瑞克·卡特（Eric Carter），以及来自于世界上多个国家的女性主义研究者均如约至会。而担任此次会议秘书的正是段慧，除了“收获”了诸多办会的辛劳之外，在此之后，也可以说是受到论坛的启发或激发她，同时收获了自己博士论文的选题。不久，段慧即赴加拿大访学，收集论文所需的各种资料，投入到对她来说兴味盎然，其实相当艰辛并富有挑战的论文写作之中。

“后女性主义”概念自1982年被苏珊·波罗丁（Susan Bolotin）正式引用以来，便渐次在英美等学术界流传，至今已属一业内耳熟能详的语汇，但是几乎每一种试图对该话题有所论述的著述，又都会提出自己的看法，以至于歧义纷出，难以找到一个公认的定说。关于这一现象，段慧的论文中也已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其中，我想至少有两个问题需要提前解决，以便可以划定出一个可用于操作的界域，并为自己的写作确立一大致可循的解释性框架。

首先是后女性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对“后”的指称的理解是有密切关系的。当然，与其他的“后学”一样，后女性主义既笼统地意指一种时间次第上的更替，也具体地意指现代性情境的跨越，由此而表明

是以一种崭新的理念或姿态来组合自身观念的。但是这样的解释依然是不够的，正如我们所见，在实际的讨论中仍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辨识。从“拒绝”论与“回溯”论的表述看，它们所提出的后女性主义，一般更偏向于从“断裂”的角度来理解新的观念范式，“post”也就意味着“pass”或“anti”。而另一种表述则偏向于将后女性主义的出现看作是对女性主义的一种再定义，是断裂与承继奇妙混合的产物，这一术语中的“女性主义”含义并没有被完全阐释，而只是以另一种方式有别于之前的女性主义，为此只能将之与“第三波女性主义”的提法联系起来看待。从断裂的角度看（这也是二者共认的），新的形态主要表现为从二元论向多元论、从政治性向私人性、从平权诉求向自我赋权、从一致认同（consensus）向差异性表达、从基础主义向解构主义等的转换。而从承继的角度看（即后一种立场），则后女性主义不仅一如既往地分享着前女性主义的成果，同时也在其看似颠覆性的外表后隐匿着女性主义的脉动、焦躁与彷徨，即便是出现了那些屈从性的回溯，也绝不可能是全面的、彻头彻尾的。仅就以上而言，后女性主义话语在处理其与现代性以及女性主义的关系时，会比经典化的后殖民主义话语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这也是需要提前有所意识的。

其次是如何确认后女性主义的端点。尽管在后期的研究中也有学者如索菲亚·孚卡（Sopia Phoca）从欧陆的视域出发，将这个端点前移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比如 68 风暴时期），就理论的起步（如解构主义、后精神分析）看，这样的论证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并不代表生活态度、媒介表征与建立其上的文化批评的整个转向。特别是我们所看到的，像批评场域中作为结构主义女性批评的焦点之作，即劳拉·穆尔维（Laura Mulvey）的《视觉快感与叙述电影》直到 1975 年秋才正式发表，并借此引发了学者们在相关领域的广泛论辩，因此多数学者依然同意将 20 世纪 80 年代后以来，美英（尤其是美国）后女性主义批评的兴起及其大规模地讨论新的性别问题作为这一思潮的端点。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尝试将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在 80 年代对女性主动性、快感政治、受众研究的成果嵌入到后女性主义的脉系中，从而不仅将这一思潮的端点稍加提前了，同时也展示出一种前后之间“过渡”的轨迹，填补了那一突然“断裂”的空白。从段慧的脉络梳理上看，她显然是偏向于后一种观点的。当然，如果不是从大规模涌现的现象看，即仅仅从理论话语的使用

上看，像前文提及的法国端点论、英国端点论与美国端点论或许也是可以在某种具有延展性的线路上串联起来的。

除了以上两点之外，在具体的研究中，对后女性主义各种现象的归纳仍旧要比我们所想象的困难得多。尽管没有对“节奏”与“类型”的把握，就无法进行整体性的观察与梳理，但诚如我们所知，后女性主义的出现本身即因于女性或女性主义被本质化的认同危机，同时也是为了能够消除将所有女性都视为一种“在共同的周延之内生活与呼吸”的主体观念，因此，很显然，后女性主义也不会沿着某种确定的“结构”与“方向”展开，而是更呈现出一种空间上弥散与时间上延宕的多样性，这点我们既可以在后女性主义表现出的生活形态上，也可以在其关于种族与性征的论争中见出。为此，对之的考察（尤其是90年代之后），也就很难找到一个共同的群体性话语的基础，难以从中归纳出一个整齐划一、依次更新的演化进程。无论是在女性生活的全景，还是在特定的后女性主义潮流中，我们更易见到的是那种间断性的、卷筒式的翻新，跨越界限与有限回退的同时存在，有关性别与性向问题的胶着论争，多重历史与时间性在其中的繁衍……这必然也会给我们的归纳与综述造成许多的不便，对一种雄心勃勃的写作计划构成严肃的挑战。如果不考虑这一点，那么也就会与后女性主义的真实表达失之交臂。就我看来，在情况之下，我们或许只能做到有限的“分域”，这是指一方面需要主动地意识到能力的有限，以便对对象保持一种开放的姿态，另一方面则仍然需要借助于旧式的推论方式去设定一些书写的界域，以便使学术性的撰述能够较为顺利与流畅地进行下去。

此外，还有一个难点也需要提出来，这就是后女性主义与后女性主义媒介批评两概念之间的关系。两者是不能想当然地可以对应起来的，后女性主义并不等于就是后女性主义媒介批评，反之亦然。在我看来，后女性主义至少应当包含三个层面，即作为生活形态的后女性主义、作为文本表征的后女性主义，与作为批评话语的后女性主义，三者共享了同一个冠名，但并不分享同一种指意，这也是由不同的“类属”所决定的。在其中，以已然设定的媒介研究领域而言，作为批评话语的后女性主义很明显是后继性的，并主要是在语言分析的层面上来贯彻自己的意见，它也是针对媒介表征而言的一种思想与学术实践，大致可称之为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工作”。媒介表征则主要为另一类人即“媒介文化人”所执掌，并归属于另一种机制或机构，从而也会在其中隐含有特定

的机制欲望或意识形态，因而，虽然从表面上看它会顺应于当代生活的态势，但也会主动地充当起一种建构性的角色，将自己的某种引领性作用投射到后女性主义生活形态的重塑上。这也恰好说明了“表征”从来都不是单纯客观的，而是始终含有意义倾斜性。以此而言，不同的层次均会表现出自身的某种独特性，在确定的演绎方向上，如何解释不同层面之间的关联与差异——这一复杂的纠葛，以及各层次内部常常出现的各种杂音、噪音等，想必这也将是一项严肃的学术工作所不可避免地要认真面对的，从而对我们的研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不少学者在讨论后女性主义时也提到了消费主义对之的渗透与影响，这既与生活方式上的后现代转型有关，也与媒介的商业主义导向的持续强化有关，从而在后女性主义与女性主义（“前女性主义”）之间划出了一条尽管并不是十分明晰，却自然存在的分界。这同时也会引发我们对时代外部语境的积极思考。毫无疑问，后女性主义不是单纯关于性别的叙述，不是一场自言自语的活话剧，而是与全球化资本主义的逻辑进程具有互嵌性的一种社会实践。既然如此，那么下一个问题又来了，消费主义究竟是提升了父权制的威权还是对之有所冲击与消解，在同样的语境中，女性是具有了更为独立的价值还是更趋向于依附于那个大的“结构”了？我们有可能对之做出一些令人信服判断吗？

最后是一个有关研究主体的身份问题。如同在平常的生活之中，女性看待女性与男性看待女性是会存在着视角上的一些差异的，在研究中也会一样，女性研究者发现问题与加以评判的方式也多少会有别于男性研究者。如果说男性往往会以“他者”的角度涉足其中，那么女性则多会以“自我的他者”来审视以女性为主体的性别问题。虽然这样的提法似乎又回到了二分法的思维，但是，说实在的，我们尽管力图消除这种符码配置上的固习，但如上文所暗示的，我们依然无法真正地去清空、抹除一些传统的思维习惯，这或许是语言的深度模式带给我们的某种拖累吧。当然，相对来看，在这一确定的领域中，女性的视角应当是更为敏锐、恰当与有效的，尽管它不会是全智性的。以这样的方式来提出问题，或许可以为其他视角的可能性留出一些必要的空间。

以上只是我对这一课题所做的一些断续性思考。因段慧的这本著作主要是梳理与描述性的，故并不需要对上述的所有问题均给出明确的解答，但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项研究所能攀升的高度，反映出

一个学者处理复杂现象的能力等。不管怎样，在段慧的著作中，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其为之所做出的种种努力，这也就足以让我们放心了。不久前获知段慧的博士论文在修订之后即将付梓，也为之而感到高兴，应作者之约，撰成小序一篇，以敷陋见，并托此为贺。

黄卓越

2017年6月于北京西北郊

目 录

序 言	(1)
绪 论	(2)
第一章 流变与勾连	(29)
第一节 女性主义、媒介批评	(29)
第二节 女性主义媒介批评与文化研究	(40)
第三节 后女性主义媒介批评	(48)
第二章 女性主义受众批评：过渡与深入	(63)
第一节 精神分析理论影响下的受众批评之先声	(64)
第二节 积极的女性受众	(72)
第三节 从抵抗到愉悦	(86)
第三章 后女性主义媒介多元、差异化身份批评	(101)
第一节 种族与身份	(105)
第二节 媒介性别差异化身份批评	(122)
第三节 种族与阶级混杂身份批评	(137)
第四节 乌托邦身份批评	(140)
第四章 后女性主义“反挫”及相关媒介批评	(148)
第一节 《甜心俏佳人》：女性主义与女性气质批评	(152)
第二节 《欲望都市》：女性欲望批评	(155)
第三节 《BJ 单身日记 1》及相关媒介批评	(166)
第四节 《绝望主妇》：家庭中的绝望抑或快乐	(172)

第五章 “女孩力量”与小妞电影批评·····	(184)
第一节 青少年女性文化现象研究·····	(185)
第二节 麦当娜现象批评·····	(189)
第三节 小妞电影批评·····	(198)
结 语·····	(218)
参考文献·····	(222)
后 记·····	(246)

绪 论

当今世界是一个媒介无处不在的时代，大众媒介作为社会意识载体渗透到社会文化生活的诸多方面。大众媒介不仅构建了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文化奇观，媒介中的人物形象也在无形之中影响和构建着社会成员的身份和关系，甚至推动新兴文化的出现。媒介全方位地渗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迅速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同时作用于我们的思想，影响我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美国媒体文化研究者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深刻指出媒介文化的影响关乎性别，媒介不仅树立了“男人或女人的典范”^①，“凭借其令人着迷的平台，塑造着我们对性别的理解。通过向我们展示女性、男性及其关系的媒介形象，暗示男人和女人个体形象应该如何展现”^②；而且成为社会文化建构过程中社会性别再现的重要途径，主流社会塑造性别身份和两性社会地位的合谋者。因此，性别与媒介的共栖建构或解构不断引起传播学、社会学和女性主义批评的关注。

女性主义学术批评由女性主义运动发展而来。女性主义运动从追求妇女的受教育权和选举权开始，不断向男性主导的权力机制提出挑战，对由父权/男权支配的社会建构、意识形态和哲学理念发出质疑。“女性主义希望通过在哲

^① Douglas Kellner, *Media Culture: Cultural Studies, Identity, and Politics between the Modern and the Postmodern*,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1.

^② 朱亚丽·T. 伍德：《性别化的人生——传播、性别与文化》，徐俊等译，暨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5页。

学、文学、政治、经济和大众媒介等方面建构主体新思维的方式来改变社会文化”。^① 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与实践沿着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线路由基本人权的诉求发端，继而深入到社会分工、经济状况和生理及心理特质等多方位探究妇女从属地位的根源。在此过程中发现了父权制度如何通过道德教化、教育手段、知识传播和权力分配等手段对妇女实施结构性压迫和有预谋的他者化策略。女性主义媒介批评者在广泛的传播领域注意到上述压迫策略，从 19 世纪末期到 20 世纪 50 年代逐渐采用大众媒介作为主要介质。女性在媒介文化中要么成为“看不见”的存在，拉寇指出“媒介文本没有再现女性文化，媒介就是（父权）文化。更准确地说，媒介中没有妇女，也没有妇女的表征”^②；要么按媒介传统惯例被塑造为无主体性可言的“家中天使”，将其禁锢在家庭之中，置放于主流社会和话语之外。这种被抹除的、被消声的、被错误表征的、被父权体制操控的女性媒介现象引起女性主义媒介批评者的关注。他们对妇女在媒介表征中的刻板形象和主体缺失的质疑将女性主义及其批评的视角转向了媒介中的女性形象和屈从地位的根源探寻。因此，女性主义媒介批评协同女性主义文学和文化批评，以及女性主义运动共同致力于女性在日常生活和上层建筑中的平等权利诉求。

虽然早在大规模的女性主义运动之前，西方社会已经零星出现女性主义思想的萌动。但是学界普遍认为，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波女性主义始于 18 世纪末。以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的《为女权主义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③ 为标志，直至 20 世纪初期。第一波女性主义致力于揭露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唤醒女性争取权利的意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诸多西方国家的妇女先后争取到了选举权、教育权，甚至就业权等被视为这次女性主义运动的标志性成果。20 世纪 60~70 年代，处于低迷状态的第一波女性主义运动中心由欧洲转至北美，掀起了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的新高潮。相比第一波，第二波的女性主义呈现多样化特点。不同流派都有各自的理论依托和实践道路，强调生理、话语、社会阶层、族裔，甚至个人

① Mary Beth Haralovich, Lauren Rabinovitz, Television, History, and American Culture; *Feminist Critical Essay*, Durham and North Carolina;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

② Lana F. Rakow; "Feminists, Media, Freed Speech", *Feminist Media Studies* 1 (1), 2001, p42.

③ Mary Wollstonecraft;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Random House Inc., 2001.

经历的差异性。虽然“拥抱异质性”不仅成为了显在需求，而且也成为了女性主义内部合作的口号；但不得不承认难以共融的异质性导致第二波女性主义在无法克服的内部矛盾和外部压力下举步维艰，在困难重重中走向低谷。

至第二波女性主义时，媒介与性别已经成为女性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关注点，美国女性主义运动家、作家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的著作《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被认为揭开了美国女性媒介形象批评的开端。该作品聚焦思想文化领域，试图从这一起点上解答与消除两性差异的问题。女性主义媒介批评（或性别与媒介的关系）成为女性主义话语的主要表述空间之一。21世纪初，《女性主义媒介研究》（*Feminist Media Studies*）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评价，丽萨·迈克拉芙琳（Lisa McLaughlin）和辛西娅·卡特（Cynthia Carter）在编者按中分析指出：“过去几十年里，女性主义媒介研究和学术批评从最初的艰难跻身于公众视野，到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传播学、其他学科学者共同认可的跨学科研究。女性主义运动通过大众媒介及其各种表征传播波及更大的范围和更多的人，其影响也因此进入了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之中。21世纪，女性主义媒介研究成为一个影响深远的领域，在文化和批评研究中也树立起了权威形象。”^①可以说，正是与20世纪70年代末期主要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辅以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的共同作用，80年代后的女性主义发展的新取向得以确定，开始了女性主义媒介研究。

对于女性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发展，学界一般有两种称名，第一种比较常见的是“第三波女性主义”，此称名指这一历史时段被视为在第二波的理论 and 实践后的新一波政治运动。这一波的女性主义者以出生在第二波时期（即20世纪50~70年代）的青年女性为主，虽然主要延续了第二波的发展脉络，但是与此前的思潮存在一些政治和文化差异。另一种称名即“后女性主义”，这一提法从青年女性社会生活上多呈现出以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自我赋权方式来表现自我；思想上对第二波女性主义的理念加以质疑与超越，试图生成新的女性主义图景；学术讨论上多与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理论相结合，因此在英语命名上与后学浪潮享有一个共同的前缀。由于本研究试图在兼顾种族和性别取向两个大的方面的同时，能够紧扣知识界的理论

^① Lisa McLaughlin and Cynthia Carter, *Editors' Introduction*, *Feminist Media Studies*, 2001, p5.

发展趋向来考察本期的女性主义媒介批评，以故倾向于使用第二种称名。

女性主义媒介研究，如前文所指，随着女性主义的发展，于20世纪30~60年代已经呈现出以女性主义电影评论和媒介女性形象批评为主，以文学、戏剧等批评为辅的研究特点，为下文讨论之便，故暂且称其为女性主义媒介批评的第一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可被认为是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的女性主义媒介批评先后借助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方法，以及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意识形态，最终形成了女性主义的电影和电视批评理论和研究方法。虽然上一阶段的女性形象批评和文本批评的传统仍然可见，但更多的精力已移至受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等理论的推动下所做的电影生产机制和生产意义的研究。在这些思潮与方法的指导下，一些电影制作人电影生产与女性主义批评的观点结合衍生出先锋电影实践。

继第二波女性主义/结构主义与精神分析女性主义之后，我们迎来了后女性主义时代。后女性主义的命名以女性主义为其根本，我们必然要考查其命名的理由以及在女性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内部关联。然而，学者们的研究也发现，这一时期女性主义批评内部产生的分化正在打破共同理论基础，差异化和多元化使得研究目标和批评对象更显具体化和碎片化。也就是说，后女性主义时代的女性主义批评不仅受到了来自外部的精神分析，后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多种思潮和理论流派的影响，发生了意识形态和文化层面的变革；也受到了来自于女性主义内部的各种自我质疑，显示出了其来源的庞杂与流变特点。

就白人中产阶级女性而言，女性主义阵营内部对女性主义的发展表现出了颇为矛盾的态度。在美国，如《美丽迷思》(The Beauty Myth, 1991)的作者纳奥米·沃尔夫(Naomi Wolf)在其著作和文章中指出前期女性主义政治目标和斗争策略对于这个时代的青年女性而言已经不合时宜。如果还期望女性主义继续有所作为，并能够增加新鲜血液、注入新的前进动力，那么就急需更新和调整第二波女性主义的斗争策略，以切实满足时代的需求。^①即便如此，纳奥米·沃尔夫对女性主义是否具备与时俱进的潜力并不乐观，认为女性主义

^① Naomi Wolf: *The Beauty Myth*,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91; Naomi Wolf: "Last but by No Means Least", *The Guardian* 21(2), 1990.

认识论会因为陷入困境而最终被时代淘汰。女性主义学者彼此之间也很难达成相互认同的观点，例如，英国学者罗萨琳德·考沃德（Rosalind Coward）对美国学者苏珊·法鲁蒂（Susan Faludi）在《反挫：对美国妇女不宣而战》（*Backlash: The Undeclared War Against American Women*）中对第二波女性主义批评和分析是否能够解读当代妇女的复杂问题及其可行性提出了疑问。罗萨琳德不仅认为激进女权主义对女性主义碎片化论调的指责无益于问题的解决，而且对那些将强奸、暴力、性别主义和经济不平等问题一概而论的全球化理论给予嘲讽。她认为这样做不仅不能提高妇女地位，反而加剧了妇女地位的下降。^①

从少数族裔的观点来看，少数族裔妇女和女性主义者在较早时期积极参与女性主义运动，但是她们发现在这场号称全体妇女的运动当中，并没有体现她们的权利需求。美国黑人女诗人奥卓·罗德（Audre Lorde）表达了少数族裔女性主义者对女性主义内部差异化的看法：“（虽然存在着）不同的族裔、性别、阶级和年龄差异，但改革派们却要我们一味忽略妇女之间的差异，完全否定了日常生活中各种差异的创造性。”^② 1995年，华裔澳籍学者洪恩美（Ien Ang）对此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她认为女性主义者之间出现了沟通危机，并指出：“女性主义者需要以一种更加谦逊的姿态寻求新的开端。可以预见的是像姐妹情谊这种有局限性的基本概念需要改变……承认局限性和直面顽固的‘沟通障碍’带给我们的收获会很多。这样要比仅仅是为了急于消除隔阂的想法和寻求理想化的一致性好得多。”^③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女同性恋者也因为在异性恋中心的女性主义文化中受到的不公平对待提出了抗议。密歇根大学的文化人类学家、盖蕾·鲁宾（Gayle Rubin）认为虽然女同性恋女性主义者早已在激进女性主义者建构的框架内参与了女性主义运动，但在女性主义的研究中，女同性恋或其性欲主题除

① Rosalind Coward; "Lash Back in Anger: Have Feminists Fired a War on Women?" *The Guardian* 24(3), 1992.

② Audre Lorde; "The Master's Tools Will Never Dismantle the Master's House", in C. Moraga and F. Anzaldúa (eds.); *This Bridge Called My Back: Writings by Radical Women of Color*, New York: Kitchen Table Press, 1983.

③ Ien Ang; "I'm a Feminist but...", in B. Caine and R. Pringle (ed.), *Transitions*; New Australian Feminisms, Sydney: Allen and Unwin, 1995.

了充当研究的次要内容或补充内容外别无意义。^① 虽然盖蕾支持女性主义认为性欲是造成女性受压迫的重要原因的观点，但她对自己被激进女性主义者看作反性别保守主义者而不满。因为在激进女性主义者看来，任何性欲表达都带有男权的特点并且是男权至上的产物。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家兼作家，凯萝·万斯（Carol S. Vance）更加直接地指出女性主义的尴尬在于总是把性愉悦与性危险划上等号。就此而言，大多数酷儿学者和性少数研究者认为女性主义的反色情观点和对虐恋的敌视态度说明他们对性欲尝试、愉悦和乐趣知之甚少。^②

在理论层面，随着来自不同群体女性主义者多样化声音的出现，学者们进行了诸多反思。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著名理论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认为女性主义政治框架并非要有稳定的共同基础和主体性才能得以建立，“长期以来，人们对女性意味着什么存在固定的看法，视之为理所当然。我们必须从这种刻板化思想中解脱出来，并拓展作为女性的多种可能性”。^③ 在异质性彰显的后女性主义时期，女性主义该如何寻求出路成为女性主义者们共同关心的问题。伦敦大学金匠学院的文化研究学者安吉拉·麦克罗比（Angela McRobbie）教授也对后女性主义时代的女性主义文化提出了疑问，“女性主义如何能够在当代青年女性中获得再生？青年女性与女性主义保持什么样的距离才能切断与母辈承载的历史经验的联系？她们是怎样探寻通往新的女性主义道路？在寻找过程中又是如何重新定义女性主义？这些问题事关女性主义如何延续的问题。更关键的是，认清不同历史、经历和身份之后，如何继续发展的问题”。^④ 上述四个方面的内容构成了女性主义者对后女性主义时期的探索主旋律。

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后女性主义普遍表现，媒介表征中的女性主义政治也随着女性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内部分歧和外部影响而变得愈加难以琢磨。在第二

① Gayle Rubin: "Thinking Sex: Notes for a Radical Theory of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 in H. Abelove et al. (eds.), *The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1993.

② Carol S. Vance: *Pleasure and Danger: Exploring Female Sexuality*, London: Pandora, 1992.

③ Judith Butler, Joan W. Scott (eds.), *Feminists Theorize the Political*, London: Routledge, 1992, p16.

④ Angela McRobbie: *Postmodernism and Popular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68.

波女性主义时已经意识到媒介批评的重要性，以及大众媒介与女性主义发展和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大众媒介发展迅猛的后学语境中，厘清后女性主义在大众传媒裹挟下的文化政治对当代女性的影响，对探索女性主义的意义及效度极为重要。如何理解媒介文化在父权文化框架下作用于女性，以及女性在媒介文化消费和自我赋权的过程中改变女性地位和建构“新”女性身份等问题也成为研究的重点。

英国自由撰稿人和文化研究博士乔安娜·霍罗斯 (Joanne Hollows) 和华威大学的瑞秋·莫斯利博士 (Rachel Moseley) 在其合著《大众文化中的女性主义》中指出“20世纪80~90年代美国电视中的‘已经解放的妇女’往往被置于女性主义和女性气质难以抉择的犹豫和徘徊之中……她们常常处于工作与家庭、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性欲和母职的摇摆不定之中”。^① 这样的大众媒介表征带来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一方面使得早期以女性运动为特征的女性主义思潮和资本市场操纵下的女性主义者彼此疏离，甚至形成了对立关系；另一方面，由于大众媒介在主流意识形态下的叙事和形象将当下女性的种种遭遇归罪于女性主义运动，也造成了女性观众的排斥感和畏惧感。这两方面的影响在女性主义媒介批评中主要呈现为两种不同的趋势，一种是受到挫折后退回象牙塔的消极应对策略；另一种则结合后女性主义文化、消费主义和影迷文化等影响的研究，以一种更加多元、开放、理解和包容的态度对后女性主义媒介给以客观批评，并且尝试寻找新的突破。总体来看，后女性主义阶段的媒介批评者仍然在不断地努力，希望找出广为认同的，能够为当今复杂与困惑的后女性主义媒介批评探寻方向，并最终形成有指导意义的观点和理论。

虽然从整体上清晰地描述后女性主义的媒介批评有一定的难度，但如果我们将其置于整个女性主义及其批评进程之中加以细查，还是能够发现并归纳出一些相对有序的发展线路，以及一些不同批评类型彼此之间勾连的关系。基于此，也为了整体地揭示出后女性主义的各种发展趋势，本课题尝试对其理论思潮和话语类型进行溯源性梳理，考察其社会文化根系与各种后理论之间的关联或冲突，通过对已波及全球的媒介文化政治话语实践，特别是女性主义媒介批

^① Joanne Hollows and Rachel Moseley, *Feminism in Popular Culture*, Oxford & New York: Berg, 2006, p12.